

艾周昌教授与非洲史研究^{*}

张忠祥

【提要】 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经过几代非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和中非关系的大发展,中国的非洲史研究遇到了好时机。为了今后的发展,有必要进行学术史的回顾。艾周昌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学者,在非洲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本文拟回顾艾教授的学术之旅,主要从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与特点两个层面,比较全面地总结他对中国非洲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 艾周昌 非洲史 “500 年中断说” 非洲黑人文明

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起步比较晚,大致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 年的万隆会议促进了新中国与非洲国家邦交关系的开启,加之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中国视非洲为外交上的重要依靠力量。从这时起,我国开始重视对非洲的研究,原先从事世界史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转到非洲史领域,如北京大学杨人梗先生原先研究法国史,他为了国家的需要,转向非洲史的研究。此外,向达、张铁生、陈翰笙和纳忠等先生都是新中国非洲史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也培养了如艾周昌等知名的非洲史研究专家。改革开放以后,非洲史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非洲史研究学者。

时至今日,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尽管中间有过停顿,但是经过几代非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非洲通史、非洲殖民史、非洲文明与文化史、非洲国别史、中非关系史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建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前,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和中非关系的大发展,中国的非洲史研究遇到了难得的好时机。为了今后的发展,把中国非洲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有必要对非洲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回顾。目前,从总体层面回顾中国的非洲史研究的论文已经有了若干篇^①,但是个案研究几乎是空白^②。

艾周昌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学者,在非洲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本文拟回顾艾教授的学术之旅,主要从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与特点两个层面,比较全面地总结其对中国非洲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项目编号:14AS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Li Anshan,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8, No. 1, 2005, pp. 59–87. 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西亚非洲》2011 年第 5 期,第 3—13 页;沐涛《非洲历史研究综述》,《西亚非洲》2011 年第 5 期,第 14—18 页。

② 目前仅见吴秉真《陈翰老与非洲史学——悼念我的老师陈翰笙》,《西亚非洲》2004 年第 4 期。

一、艾周昌教授的学术历程

艾周昌教授生于1930年,湖北松滋市人,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5年重返东北师范大学,进入研究生班学习,师从苏联专家科切托夫。结业后艾老师回到华东师范大学,继续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退休。他长期讲授世界近代史、非洲史、亚洲史等课程,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亚非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等职。

艾周昌先生最初研究亚洲史。1956年,艾先生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基马尔革命》,认为这场革命的性质是“以反帝为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次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①1965年艾周昌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对非洲的早期侵略》,标志着他开始转向非洲史的研究。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干校和农场劳动,个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冲击。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艾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丰收期。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完成的。总体而言,艾周昌先生的学术研究涵盖三个领域:世界近代史、非洲史和亚洲史。

在世界近代史领域,艾周昌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编撰出版了数部《世界近代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艾先生就协助林举岱教授,主编了近55万字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此书不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材,而且被国内许多高校所采用。此书重版多次,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高校历史系采用的较有影响的教材之一,并由日本东方书店翻译出版了日文版。后来,艾先生又参与教育部的教材建设。当时教育部委托20所高校历史系合作编撰世界史教材。艾先生与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先生共同主编了教育部统编教材《世界近代史》(上、下册)。这套教材被国内许多高校历史系所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艾先生发表了《华盛顿二任研究》和《华盛顿与中国》两篇文章,客观地分析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历史贡献。1996年发表了《世纪之交——读1871—1900的世界史》一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释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内涵。

在亚洲史方面,艾周昌先生在1981年发表了《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文,认为辛亥革命是亚洲革命风暴的一部分。1989年在《史学月刊》发表了《试论16至18世纪中叶太平洋航海贸易》,探讨了这一时期太平洋航海贸易的态势及影响,认为中日等西太平洋国家当时没能冲破封闭的传统,失去了一次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1994年发表了《东亚地区的三次历史机遇》,总结了该地区的主要国家在数次现代化浪潮中的经验教训。1991年艾周昌先生与沐涛和孙科志一起,阅读大量文献并结合实地考察,考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旧址。目前,该址现已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成果不但丰富了韩国现代历史的内容,也推动了中韩关系的发展。

艾周昌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还是在非洲史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老一辈的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开设非洲史课程,培养研究人才,出版研究成果,如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纳忠的《埃及近现代简史》、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等等。艾周昌先生也是较早研究非洲史的中国学者之一。

^① 艾周昌、李德清著《艾周昌李德清文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艾周昌先生经过长期的积累,对南非华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发表了《近代华工在南非》一文。随后相继发表了《1889年中刚条约与华工》、《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中国的反响》等论文。其中,《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获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三等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1989年艾先生编纂出版了《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1995年又出版了他与沐涛合著的《中非关系史》。此外,艾先生还发表了中非古代关系的论文,如《非洲黑人来华考》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等。近代非洲殖民史是艾先生研究的一大重点。1982年艾先生发表了《关于近代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欧洲殖民者入侵非洲的动因、黑奴贸易和近代非洲殖民史的分期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后来相继发表了《殖民地时期加纳土地制度的变化》、《南非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和《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散论》等论文。

自1985年起,艾先生与北京大学的陆庭恩教授共同负责,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非洲通史》,组织国内非洲研究的学者编写三卷本《非洲通史》,该书于1995年正式出版。编著一部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非洲通史》是我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的。三卷本《非洲通史》的出版可以说是圆了这个梦。李安山教授评论说“三卷本《非洲通史》的出版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它表明我国的非洲史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尚有一定差距,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仍不失为我国学者史论结合的呕心沥血之作,是集体研究的结晶。”^①该书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的奖励,包括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图书优秀奖、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等。毫无疑问,《非洲通史》的撰写和出版,是中国非洲史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艾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1990年艾周昌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又和陆庭恩教授联合编著出版了《非洲史教程》,作为高等学校非洲史课程的教材。由于该书写作严谨、观点公允,尽管出版已有20多年,至今仍然被当作大学非洲史的教科书使用。1995年艾先生又接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研究课题“南非现代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研究课题“非洲黑人文明研究”,这些项目出版的著作《南非现代化研究》和《非洲黑人文明》,推动了国内对非洲国家现代化和黑人传统文明的研究。

1995年10月,艾周昌先生退休,告别了工作40多年的教学岗位,但研究工作并未停顿。2002年7月,艾先生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从此留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但艾先生笔耕不辍,先后与沐涛教授合作出版了《走进黑非洲》、《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等著作,单独发表了《知识经济与亚非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渐进论思想的历史演进》等论文,在中国的非洲史研究领域继续谱写“夕阳红”。^②

2012年《艾周昌李德清文选》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李德清系艾周昌先生夫人,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曾任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的助手。该文选上部为“艾周昌文选”,收录了艾先生各个时期发表的代表性论文21篇,其中,涉及非洲史的论文有16篇。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说“艾先生的研究比较广泛,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非洲史研究领域,他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毫无疑问,他对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③

① 李安山《新的辉煌,新的起点——评三卷本〈非洲通史〉》,《西亚非洲》1996年第1期,第19页。

② 沐涛《艾先生——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位辛勤耕耘者》,《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编委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未刊稿)2011年5月,第41—43页。

③ 艾周昌、李德清著《艾周昌李德清文选》序,第4页。

二、艾周昌教授的主要学术观点

艾周昌教授与其他老一辈专家一样,是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下开展对非洲史研究的,如遭受“文革”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又因条件所限制不能到非洲去实地考察,后来条件改善了,又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能出国。但是,艾先生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潜心研究,甘坐冷板凳,取得了非洲史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的成绩。艾先生之所以成为国内著名的非洲史研究专家,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学术观点。

1. “500 年中断说”是不符合史实的

所谓“500 年中断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如戴闻达和哈奇逊等人对近代中非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认为郑和下西洋后,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有一个 500 年的中断。哈奇逊在《中国的非洲革命》一书中说:“据《明史》记载,中世纪中非之间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 1441 年,其时米昔尔(即埃及)统治者遣使至明廷,‘贡骡、马及方物’。这种特殊的历史链条到此为止,两个地区下一次有记载的官方接触 500 年后才到来。在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握了手,这才开创了中国与非洲的现代联系。”^①

对近代中非关系的研究,艾周昌先生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的。早期代表性的成果有张芝联先生的《1904—1910 年南非英属德兰士瓦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20 世纪 80 年代,陈翰笙先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代文献,主编了十辑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其中,第一辑、第四辑和第九辑都与非洲有关。另有方积根编注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涉及早期华侨史。早在开普殖民地建立之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在印尼的华人送去那里做工。有一个名叫“万寿”的华人,于 1660 年抵达好望角。^②但是,回应“500 年中断说”,艾周昌教授是中国学者中最直接、最系统的一位,他依据历史事实所否定了“500 年中断说”,成为他在近代中非关系研究领域最大的学术贡献。

1981 年艾周昌在《近代华工在南非》一文中,就开始从华工赴非、人员交流的角度回应“500 年中断说”,他说:“有些学者认为,自从葡萄牙殖民者东来,中非关系似乎已经‘中断’,直到中国和非洲各族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中国和非洲人民的传统关系才得到恢复。其实,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亚非,固然使中非友好关系遭到了破坏,造成了阻隔。但是中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接触,都没有中断,只不过是具有新的特点罢了。南非华工的沧桑,是近代中非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中非关系的新特点。”^③

1984 年艾周昌在《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的一文中,系统回应了“500 年中断说”。他说:“果真存在一个‘500 年中断期’吗?当然不是。从 15 世纪末西方殖民者东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中国与非洲各族关系的发展,其地区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④他认为,近代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未“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继续着。第一,人员交流没有

① A.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Hutchinson, 1975, p. 11.

② 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31 页。

③ 艾周昌《近代华工在南非》,《历史研究》1981 年第 6 期。

④ 艾周昌《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西亚非洲》1984 年第 1 期。

中断。中国有澳门黑奴,非洲有华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与外界接触,外交人员、留学生和政治家访问欧美者,大都要途经非洲,或过好望角,或经苏伊士运河去欧洲。他们之中有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他们留下的一些回忆和游记,是近代中非关系的历史见证。

第二 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华工和华侨侨寓非洲,中非贸易也有相应的发展。在南非、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扎伊尔(今刚果金)等国均有华商从事贸易,茶叶成为中国输入非洲的大宗商品。如中国向埃及等地出口的茶叶,1903年红茶为1416担,1904年红茶6209担,砖茶35405担。

第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同非洲一些国家的殖民政府建立了官方接触。1898年签订《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刚果自由邦成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第一个非洲国家。1904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保工章程》,规定清政府可派领事,赴招收华工之英国属地“妥行保护”。据此,清政府于1905年派刘玉麟为首任驻南非领事。

1989年艾周昌教授出版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以更加详细的史料,进一步回应了“500年中断说”。这部文选包括5部分内容:(1)黑人在中国;(2)非洲见闻录;(3)时人论说;(4)华工与华侨;(5)中外关系。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的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十余年的停顿,艾先生说“1978年我重新辑录资料,约得百万字左右,从中精选编成此书。”^①18世纪起,有不少中国商人、学者和政要陆续访问非洲。该文选辑录了谢清高、王大海、马德新、容闳、郭连城、张德彝、王韬、丁廉、王芝、郭嵩焘、康有为等人的旅非游记。马德新在去麦加朝觐途中访问埃及,曾得到埃及穆斯林的友好接待,并亲眼目睹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成就。他写道“谜思尔,巨城也。时穆罕默德·尔里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浦浪西(今译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②这些记载不仅印证了中非人员交往的连续不断,而且成为研究当时非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在文选的“中非外交”部分,艾先生收录了《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和清政府在英属南非和葡属莫桑比克设领的相关文件。比如,关于刘玉麟任清政府驻英属南非总领事,文选引用了“外务部奏请以刘玉麟为南非英属总领事折”,并且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的档案、对刘玉麟任南非总领事的过程、刘玉麟与外务部的函件等都做了收录,增强了该资料的权威性。

艾周昌教授不仅系统回应了“500年中断说”,而且提出了近代中非关系的新特点。他认为,同古代中非关系相比,近代中非关系有如下特点:(1)新航路的开辟,使中国人的交往范围从原来的北非、东非逐渐扩大到南部非洲以及西非、中非的一些地区;(2)殖民者的入侵使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官方关系由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演变为经由宗主国的间接关系,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3)民间往来并未因此中断,而且日益具有相互同情的性质,为中非现代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③

2. 关于非洲近代史的一些论点

在非洲史研究领域,艾周昌教授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非洲近代史方面,在他与陆庭恩教授负责主编三卷本《非洲通史》时,具体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在非洲近代史研究方面,艾先生在早期殖民侵略史、19世纪非洲国家的改革以及殖民时期非洲土地制度的变化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研究。

①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第26—27页。

③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序,第1—2页。

关于非洲殖民史的历史分期。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分期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艾周昌先生主张,以16世纪为非洲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时在非洲已经开始了早期殖民侵略和奴隶贸易。艾先生将西方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它以奴隶贸易为主要特征,辅以局部的领土占领。这个时期,欧洲殖民者所占非洲领土面积不到10%。第二时期开始于19世纪中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是以侵占和瓜分非洲为主要特征的时期。^①

关于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的性质。从19世纪初至70年代中期,一些非洲文明古国进行过富国强兵的改革,这场改革由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开端,突尼斯继之,摩洛哥结束。关于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另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后一种意见在西方和埃及颇为流行。^②

在19世纪非洲国家的改革中,各国都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领域,各有侧重,也有共性,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近代化;另一方面是对封建制度实行若干调整和改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关于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的性质,艾周昌先生认为“诸如此类的改革,不能说成是近代化的改革,而是属于世界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封建制度的自我调整。”^③究其原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国家建立的近代机器工业,也实行相当严重的封建式管理。工人多半是强征来的农民,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没有人身自由,工资又很低,相当于生活费。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非洲国家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及其矗立其上的封建上层建筑,在改革的过程中,又没有有一个国家的改革的领导者准备摧毁旧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④

关于殖民地时期加纳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是非洲传统社会的最重要的财产,社会财富主要来自土地。除了南非少数国家外,中国学者对非洲国家的土地问题总体上缺乏研究。艾周昌先生在《殖民地时期加纳土地制度的变化》一文中,以加纳为个案研究了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土地制度的变化。

艾先生认为,殖民统治前加纳的土地归公社所有,根据使用权分为三类:即“凳子土地”(Stool Land)、家族土地和公共土地。“凳子土地”就是酋长的土地。“凳子土地”的收益归酋长家族所有,用于酋长及其家庭的自身需要,或作为举行部族各种仪式的费用。“家族土地”在本族各个家庭中分配。各个家庭掌握着土地的受益权,但土地不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继承,只有无人继承时,才归公有。使用这些土地的家庭,有义务到“凳子土地”上耕作,并把自己收成的一部分交纳给酋长。“公共土地”是一种未分配和未开垦的土地,包括荒地和森林等。

英国侵占加纳之后,要把加纳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公社土地占有制,不可能为英国资产阶级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大量的原料。为此,英国殖民当局采取措施来破坏这种社会机体。1894年殖民当局提出把一切荒地、森林和矿藏归英国皇家所有。1897年又提出耕者有其田。这两项措施因上层的反对而作罢。然而,英国殖民者却利用经济杠杆,最终还是破坏了旧的公社土地所

① 艾周昌《关于近代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② 杨灏城《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第52页。

③ 艾周昌《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散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④ 艾周昌《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散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有制,使加纳变成了英国殖民者所需要的单一作物(可可)产区。

加纳公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大体有以下几种途径:第一,昔日的酋长和贵族,利用他们的特权,集聚财富,扩大土地占有面积。第二,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和转让。第三,开垦荒地。随着公社土地制的逐步瓦解,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地主、富农、自耕农和雇农。^①

3. 关于非洲黑人文明的观点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学者看来,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大陆。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尚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己意识的(自觉的)历史之光明”。^②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如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毛赫考察大津巴布韦遗址后,认为这是外来人建造的。艾周昌教授与中国多数学者一样,都肯定非洲黑人文明的存在。但在非洲黑人文明的内涵、特性与外界的关系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艾周昌先生为非洲黑人文明的概念做了界定,他说“非洲黑人文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各民族在过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③从野蛮进入文明有三大关键要素:金属冶炼、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出现。这三大要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都已具备。非洲黑人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麦罗埃文、斯瓦希里语文、豪萨语文、瓦伊文等)、文学、史学、宗教和其他著作存留,而且有大量精湛的艺术、音乐、舞蹈、建筑和医学、科学技术遗存。所以他说:非洲黑人文明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不存种族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世界上有一个独特的非洲黑人文明存在。”^④

艾周昌教授总结出非洲黑人文明的两大特性:一是具有强烈的“非洲个性”,它是和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非洲个性”是西非民族主义思想先驱布莱登最早提出的,布莱登提倡非洲个性,是为了反对当时日益猖獗的种族歧视,维护非洲黑人的尊严,保持黑人文明的传统精神。“布莱登对传统非洲黑人文明特点的分析,除去他对村社制度和传统精神理想化的成分以外,我们可以把它精练为两点,即集体主义精神和天(神)人合一思想。这种‘非洲个性’在文学、音乐、舞蹈以及习俗各个方面都有体现。”^⑤

二是以大众文化(俗文化)为主体。人类文明史表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都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但非洲黑人传统文明是一种以通俗文明为主的文明。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的传统文明,包括传统社会里的哲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教育、文学、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历史、经济和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医学等等是一代一代地言传身教相沿为习的,或者存在于深山老林的石雕之上,古代遗址的废墟之中。”^⑥当然,不是说非洲黑人文明没有雅文化,没有文字记录的精英文化。只是说,相比之下,雅文化、精英文化相比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要相对少一些。

艾周昌教授认为非洲黑人文明不是孤立的,它一直与外界保持交流与碰撞。但在碰撞和交流中,不应是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互相吸收、丰富有自己

① 艾周昌《殖民地时期加纳土地制度的变化》,《西亚非洲》1991年第5期。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谄微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2页。

③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④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2页。

⑤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349页。

⑥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351页。

特点的文明。他说“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明,自古以来就吸收了世界各民族有益的东西,同时它也对世界各族文明发生影响,被世界各种文明吸收。即使在近代,西方国家认为黑非洲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但非洲文明对西方文明确实发生了影响,特别是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作曲家创作了一种独特的轻音乐风格。拉格泰姆和布鲁斯就是其表现形式。拉格泰姆、布鲁斯和黑人灵歌传统的结合,导致了爵士音乐的诞生。

4. 关于非洲法系的观点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以湘潭大学为代表,推出了一系列非洲法研究方面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02年,艾周昌在古稀之年撰写了论文《关于非洲法系的若干问题》,提出他对非洲法系一些问题的看法。

艾先生对非洲法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说“非洲法系是指近代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以习惯为主的习惯法、制定法和成文法的总称。”艾周昌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3个观点:(1)非洲法不应该只限于习惯法。他认为非洲法系存在成文法。非洲成文法存在于考古发现的碑铭、阿姆哈拉文、麦罗埃文和豪萨文、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如1955年在埃塞俄比亚萨文拉地方发现的碑文,出现了“第七法”的字样。这说明阿克苏姆王国颁布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2)不仅存在一个非洲法系,而且它至少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非洲传统法在所有权问题上大体是一致的,以村社公有制为主。在非洲法系国家中,土地仍然属于祖先所有,即村社所有。第二,非洲法系一般关注集体利益甚于个人利益。(3)对“非洲传统习惯法几乎没有商法”之说表示怀疑,认为,“非洲商法是非洲法系的一个重要方面”。^②这些观点都相当犀利,引发人们对非洲法系的深入思考。

5. 关于亚非国家现代化的观点

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著《现代化新论》等书,开启中国现代化研究之先河。艾周昌教授在亚非国家现代化领域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艾周昌给现代化做定义时引进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他说“现代化是指世界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社会,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并最终过渡到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过程。”^③“知识经济”一词,现在已不再流行,但是它的基本含义还在,比如现在提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艾周昌教授认为,亚非国家的现代化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要循序渐进,他说“正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非洲黑人国家,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推陈出新的方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推进。”^④

艾周昌在《南非现代化研究》一书中,将南非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全过程加以考察,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以比较。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都是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抓住世界淘金热的机会,由开发金矿而起飞的,都是属于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艾先生总结了南非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一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给新南非,也给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第一,从国际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凡属于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首先必须抓住机遇,适

①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386页。

② 艾周昌《关于非洲法系的若干问题》,《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

③ 艾周昌、舒运国、沐涛、张忠祥《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④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394页。

时起飞。第二,现代化既有突变(起飞),也有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第三,现代化必须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全面现代化。在南非这类多种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伴随各种族(民族)平等的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①

三、研究方法 with 特点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非洲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研究者的指导思想都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已经有学者提出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如刘鸿武认为“中国非洲学的核心使命,是要立足于中非关系的民族实践,形成可以说明指导这一民族实践的理论话语体系。”^②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作为老一辈中国非洲研究学者,艾周昌已经在中国的非洲史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中国学派”一些共有的特点。

第一,艾周昌在他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实,这也是中国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艾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又跟随苏联专家研究亚非史,所以,从一开始就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1982年艾周昌与程纯合写的《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列强侵略、征服和奴役非洲、亚洲、美洲各国人民的历史。该书的主要观点和不少的史料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比如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起讫时间,艾周昌教授写道“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界说,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殖民,开始于十五世纪末美洲的发现和航路的开辟,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③

艾周昌先生作为两大总主编之一的三卷本《非洲通史》,也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凝聚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心血的著作。编写三卷本《非洲通史》的初衷,就是要出版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非洲通史。艾周昌先生在总序里说:该书反对“黑人自古天生低劣”的观点,也不承认以“欧洲模式硬套非洲各族历史的方法论”,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④比如,在非洲近代史的问题上,艾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从非洲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他说“非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由前资本主义(封建的、奴隶制的、原始公社制的)过渡到殖民地半殖民地”。^⑤

2009年艾周昌主编出版了《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他说“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不但不会陷入宿命论历史观和一元化发展观的泥潭,而是丰富了对多种多样现代化模式的认识。”^⑥他把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归结为五类,即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驱动型、农业发展驱动型、出口加工导向型、大国综合驱动发展型和科技知识启动型。艾周昌先生认为西式现代化之路在亚非行不通,他说“除日本因其特殊的国内外条件外,亚非国

① 艾周昌、舒运国、沐涛、张忠祥《南非现代化研究》,第264—265页。

② 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3页。

③ 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④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⑤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第1页。

⑥ 艾周昌主编《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家在 19 世纪的现代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亚非各国走‘欧式’或‘西式’的现代化模式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究其原因有二：一曰水土不服，二曰先生打学生。”^①

第二，艾周昌秉承中国非洲学者优良传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洲。这种视角与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非洲文明和非洲历史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者长期认为，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大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仍然有西方学者否认非洲历史的存在。1963 年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罗珀(Hugh Trevor-Roper)说：“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②艾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事实出发，肯定非洲历史和非洲文明的存在，他认为“非洲的文明，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统一规律可循，又有许多特殊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可能首先发生在非洲。非洲也是世界上最先出现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国家组织的一个大洲。”^③近代非洲的落后并非黑人文化传统造成的，“而是 15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留下的恶果。”^④

他对非洲历史发展保持乐观，相信非洲有美好的未来。1999 年艾周昌先生在《非洲黑人文明》一书中说：“现在，黑非洲各国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只要各国人民排除各种障碍，团结一致，迎接挑战，一定会在非洲黑人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现代化的非洲黑人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魏源的‘与欧罗巴埒’的预言，一定会到来。”^⑤当前，非洲形势与冷战结束之初相比，已有很大改观，非洲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和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西方主流媒体《经济学家》杂志也从 2000 年对非洲定位的“失望大陆”，到 2011 年变成“希望大陆”。^⑥非洲联盟已制订《2063 议程》，提出要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100 年之际，实现非洲的真正复兴。总之，非洲已经开始显示出发展的无限前景。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洲，这也是中国学者研究非洲历史的普遍立场。一方面，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为弱者、为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呐喊，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历史传统；另一方面，非洲的“落后”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更非“黑人天生低劣的产物”，而是西方殖民侵略的产物，这是一个发展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非洲的看法也在改革，那种认为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明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⑦

第三，踏实的学风与现实关怀相结合。从艾周昌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老一辈史学家所提倡并践行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优良的学风。艾周昌先生为了研究近代中非关系，专门从编辑文献下手，整理出版《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原外交部副部长、时任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宫达非先生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艾周昌同志广搜博采，孜孜不倦，倾十余年之心血，编注了这部《中非关系史文选》，为研究我国同非洲大陆的交往史辑集了宝贵的资料，为增进中非

① 艾周昌主编《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第 14 页。

②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The Listener*, 28 November 1963, p. 871.

③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第 2 页。

④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第 3 页。

⑤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4 页。

⑥ “The hopeful continent: Africa rising”.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1015> [2017-01-10]

⑦ 参见 J. 基-泽博编辑《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9—30 页；张忠祥《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4 期；John Edward Philips, ed., *Writing Afric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5, pp. 25-50.

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①为了完成高质量的三卷本《非洲通史》,艾周昌教授与编委会的其他同志一起,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一是做资料准备工作,编译《非洲通史资料选辑》;二是做理论研究工作,组织专家就非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例如非洲社会的演变、非洲传统的经济形态、非洲的政治体制,以及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

艾周昌先生一方面,以踏实的学风,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进行非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现实关怀跃然纸上,将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中非关系的发展。因为中非之间战略上的相互依靠,用今天的话来说,中非历来就是命运共同体,艾先生高度肯定研究非洲史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趋势,需要搞清非洲政治、经济‘热点’的来龙去脉。”^②

艾周昌先生与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具有一种使命感。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老一辈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艾周昌回忆说“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近代中非关系史方面,连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一本资料书《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后来我与沐涛同志合作完成了《中非关系史》,了却了一桩心愿。”^③

艾周昌先生与老一辈史学家一样,他们做非洲史研究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因为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很强的敬业精神,他们成就了不少的学术精品,并且回应了他所处时代关切,包括回应了“500年中断说”,编纂三卷本《非洲通史》,撰写了《非洲黑人文明》等。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研究重点,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史、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史和古代中非关系史等是当时的研究重点。当下,非洲经济史、非洲医疗史、非洲口述史、非洲妇女史、非洲史学史、非洲国别史、中非关系史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学术研究的长河中,需要每一代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新一代非洲研究学者要紧紧抓住当前中非关系大发展和研究条件大改善的历史机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景德祥)

① 宫达非《了解非洲,研究非洲——读〈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世界知识》1989年第19期,第26页。

②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第2页。

③ 艾周昌、舒运国、沐涛、张忠祥《南非现代化研究》,第1页。

class only for criticizing their role in history. In so doing, he swept aside the obstacles in evaluating the bourgeoisie on a factual base for their contribution at some stage of history when they rose in challenging feudalism. Later, by uphold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e inaugurated a new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bourgeois class, which was termed "Studying the Context or the Soil of Social History." Zhang advocated a new research vision and new methods: examining connections from past events to the present and drawing parallels between similar but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events. He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sightful opinions on the concept, pattern, category and scope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bourgeoisie; all of which improved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As a celebrated scholar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Zhang Kaiyuan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s in empirical study, but he also developed profound research theory and techniques for the field. The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benefited greatly from his scholarship.

Ai Zhouchang and His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 Zhang Zhongxiang

The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began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ago in China. Thanks to the contributions of scholar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field has achieved a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meantime,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Chinese studies of African history remains behind. China's rapid rise as a world power and its closer relation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ve provided an opportune time for Chinese African historia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field better into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view what has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frican historians trained in China, Ai Zhouchang is a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scholar in the field.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Ai's career, focusing on his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It is meant to b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i Zhouchang's scholarship in African history.

When Did Modernity Begin in Jewish Societ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 Ai Rengui

On the issue regarding whe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beg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several paradigm shifts as follows: scientism-nationalism-Diaspora standard-global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Wissenschaft* scholars who advocated Jewish integration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believed that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began with Haskalah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upholding the Palestino-centric historical view, the Jerusalem School stressed that modern Jewish history did not star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Jews into the mainstream foreign society, but began wit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ties between the Jews and their homelan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Jewish historians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vocated Jewish autonomy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Diaspora. Then from the 1980s,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that focuses on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scholars push the research into the early modern era for discussing Jewish modernity. The evolution of these different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has reflected variou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among Jewish historians of different ages. The historiography has registe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identity politics.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in France from the 1970s // Yuan Lili

The challenge facing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how to prove that the studies are both scientific and legitimate academic fields. French women and gender historians faced the same challenge. In writing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French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from the 1970s on two fronts. One is to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history per se to the combined interest in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The other is to analyze the categorical change from women to gender as a 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 The French example shows that women's history changed from targeting male-centered historiography for criticism to analyzing the gendering process of all actors in history; the latt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and reconstruct historical study by taking women's, gender and/or combined perspectives. These change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fields have become both scientific and legitimate.